

中华海洋文明论发凡

杨国桢

摘 要:海洋文明是人类源于直接与间接的海洋活动而生成的文明类型。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抑或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外源推动的新文明因素,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现代化提出的问题。重新审视海洋文明的概念内涵,进行修正和重构,掌握学术话语权,是一个具有创新性和重大意义的任务。

关键词:海洋文明;概念内涵;现代化;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3)04-0043-14

人类对自己创造的文化与文明,有着多种多样的诠释,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作出公认的定义。文化与文明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但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往往被视为同义词,没有严格的区别。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区分了文化与文明,认识并不一致;而文化与文明作为自清末从西方转输到中国的新概念,内涵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状况也深深地影响到中国学者对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概念的界定。

中国学界对海洋文明的认识和研究是从20世纪初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开始的。受西方论述和传统陆地思维的双重制约,中华海洋文明的研究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没有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海洋文明理论建构,本土学术资源的发掘和学术成果的积累都相对匮乏,不成系统。以至今日,在前期力量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承担国家的海洋文化建设的使命,面临巨大的挑战。什么是海洋文明?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抑或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外源推动的新文明因素?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和内部结构的历史认识,关系到为何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判断,有必要从理论上给予说明。

一、西方的海洋文明观念

海洋文明是西方学者在总结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历史作用时形成的概念。汤因比曾说:“西方划时

作者简介:杨国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09JZD0015)阶段性成果。

代的发明是以‘海洋’代替‘草原’,作为全世界交往的主要媒介。西方首先以帆船,然后通过轮船利用海洋,统一了整个有人居住的以及可以居住的世界,其中包括南北美洲。”^①西方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凸显了海洋在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地位,“当海洋这一根本能量在16世纪突然爆发后,其成果是如此深巨,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席卷了世界政治历史的舞台”^②。与欧洲人文主义兴起、宗教改革、经济社会转型相呼应,“自由的海洋与自由的国际市场在自由这个观念中汇合了……随着机器的发明……巨大的海权同时成为巨大的机械力量……工业革命把那些从海洋这一元素中诞生的海的儿女变成了机器制造者和机器的奴仆”^③。

在西方知识体系中,早期文明开始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畔的河流文明。“海洋文明”一词首见于希腊语,被用于总结克里特岛上依赖海上商业、海盗劫掠和殖民征服起家的米诺斯文明(公元前3000~公元前1400年)。古典文明时期(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之间的地中海是文明世界的中心。米诺斯文明及后继的迈锡尼文明中的海洋商业文明因素为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所继承。中世纪文明时期(500~1500年),北欧“蛮族”维京人的海上崛起,创造了300年(800~1100年)的“海盗时代”。14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共和国以海上贸易为立国基石,依赖海洋发展商业文明。近代文明时期,海洋文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西班牙,继起的西欧低地国家荷兰和岛国英国,导致大西洋经济的兴起。随着欧洲的扩张和征服,非西方世界被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成为附庸。

伴随欧洲“确立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主宰地位”,“引出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世界的这小小一隅能够战胜所有的对手,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美洲、非洲和亚洲?”^④这就导致西方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出现:“十九世纪在欧洲和美国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当时的欧洲世界感到自己在文化上取得了凯旋式的胜利,从许多方面看来也的确如此。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欧洲都征服了世界。”^⑤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人类文明的地理基础分为三种形态:高地、平原流域和海岸区域。在第一、二类地区,“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而在第三类区域,“大海却挟着人类以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产出一种以船为工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的海洋文明。海水的流动性,决定了海洋文明超越大地限制的自由性、开放性,“大海给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人类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海水喜怒多变的性格,决定了海洋文明打破常规、冒险进取的勇敢精神,航海家冒着生命财产之险求利,“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

① 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5页。

② [德]C.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③ [德]C.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59页。

④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0页。

⑤ [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5页。

必须与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①

黑格尔把温带视为历史的真正舞台,认为在美洲“新世界”出现之前的世界历史舞台,即由欧、亚、非三大洲组成的“旧世界”,是由地中海结合成为一体的,“地中海是地球上四分之三面积结合的因素,也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是旧世界的中心,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而“广大的东亚是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隔开了的”。^②希腊世界是历史的少年时代,罗马世界是历史的成年时代,日尔曼世界是历史的老年时代,而东方世界是历史的幼年时代,古代文明国家如中国、印度、巴比伦“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无论如何,在他们的文明刚在成长变化的时期内),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行发展到怎么样的程度——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只由于其他民族把它们找寻和研究出来”^③。

黑格尔讲述“哲学的世界历史”,认为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而中国和东方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幼年,“一个民族不能经历更多的阶段,不能在世界历史上两次划时代……因为在精神的过程中它只能承担一种任务”^④,所以中国和东方与海洋文明无缘。这与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不同。从历史事实而言,地中海世界通过海洋的文明互动确实在西方发展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把它视为海洋文明的唯一形态和唯一模式,是偏颇的。他把多元文明融合体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性的整体文化单位,与欧洲次级的文化单位古希腊进行比较,是为了突出古希腊海洋文明的独特性,鼓吹“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的历史观。由此出发,他所创造的海洋文明是高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的先进文明形态的话语,便成为西方中心主义海洋文明话语体系的基石。

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既然是西方兴起的动力,海洋文明自然而然地成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同义词。德国地理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在《比较地理学》(1845年)中说,世界历史开始于东方的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畔的河流文明时代,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期和地中海的中世纪文明时期,进入内海文明时代,伴随着美洲的发现和环球航行,进入海洋文明的时代。^⑤20世纪,海洋文明又进一步被发达海洋国家意识形态化,海洋代表西方、现代、民主、开放,大陆代表东方、传统、专制、保守,成为国际上主导的话语,影响并支配了文明史的海洋论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发展中国海洋国家的兴起,对本国海洋文化资源的发掘,海洋文明等同资本主义文明、西方工业文明的概念受到国际学界的质疑。首先,海洋文明可以上溯到河流文明时代,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地中海就经历了大规模的贸易、迁徙和相互影响。内海文明时代也是海洋文明,腓尼基、希腊、罗马是大海的女儿。其次,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不是截然分开的。古希腊的海洋文明以陆地山区经济为基础,“在地中海北岸,山岭犹如一道屏障,挡住了地中海航行的大敌——无情的北风,那里

①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3、84页。

②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3、84页。

③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④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⑤ [德]C.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有许多避风港。爱琴海的一句谚语说:‘扬帆起航,不管刮的是南风或是北风’。另一方面,这些山区必然把移民引向大海,而诱人的水面是沿岸交通的最佳路线,甚至是唯一的路线。海洋活动就这样与山区经济建立起联系。二者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由此产生了耕作、园艺、果木、捕鱼和航海活动的令人惊奇的结合”^①。地理大发现后,世界贸易路线的变迁,导致海洋文明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北大西洋地区,但是“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而是“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②

海洋文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多样性得到国际学界的肯定,以世界海洋区域为分析单位,成为基于民族国家及基于陆地建构的分析方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继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地中海世界的杰出研究之后,围绕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互动的进程,都有新的研究著作出现。东方文明不仅是陆地文明的代表,也有海洋文明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朝贡贸易圈和海洋亚洲的概念,把中国沿海地区与环中国海周边各国、印度洋沿岸诸国视为海域世界的重要区域,作整体的研究。^③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研究东南亚的“地中海”联结在一起的“风下之地”的共同命运,指出贸易时代给东南亚所带来的变化与欧洲一样巨大,虽然变化的方向并不尽然一致。^④中国海洋史引起西方学界的关注,涌现出一些有影响的研究论著和研究计划。2002年,英国业余历史学者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提出郑和分支船队发现美洲、澳洲和南极洲的新说,令英语世界耳目一新,产生巨大的轰动。近年,荷兰学者包乐史(Leonard Blussé)等人提出“莱茵河——扬子江”研究计划,力图探明亚欧大河流域走向海洋,从地方、区域中心到全球经济重心发展的历程。

进入21世纪,随着海洋开发的立体推进及西方扩张性海洋文明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世界海洋文明正在转型,工业文明与海洋生态文明的撞击和磨合,提供了新的物质资源和思想资源,向建构新型海洋文明的方向前进。

二、中国人对海洋文明的理解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愤于海权丧失、国门洞开的现实,接受西方的海洋文明观念和论述,普遍赞同“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⑤,把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1卷,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2页。

②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前言第5页。

③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④ [澳]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吴小安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⑤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73页。

海洋文明作为学习西方、改造旧社会的理论工具。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历述人类文明的演进顺序是：“河流时代”、“内海文明时代”、“大洋文明时代”。“河流时代”即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四个“地球上古文明祖国”的农业文明时代，“内海文明时代”即地中海文明时代，“大洋文明时代”即大西洋时代。这种时代的划分，就是把海洋文明看成是高于农业文明的先进文明形态的。海洋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西方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成为“先验性知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涉海研究已有百年之久，但由于种种原因，海洋文明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没有明确的定位。在中华文明史或文化史研究上，研究中华海洋文明的学者凤毛麟角。20世纪中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林惠祥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和凌纯声的“亚洲地中海”说，并没有动摇中国的历史是黄土文明、农耕文明的历史论述。认为“希腊是海洋国家，中国是大陆国家”^①，是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普遍看法。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界曾以西方海洋文明的“先验性知识”进行启蒙，批判中国的黄河文明、黄土地文明，刺激了对中华文明是否存在海洋文明的反思。围绕“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的论述，涉海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和延伸：

在有关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发展的讨论中，面向海洋的文明因素开始受到重视；史前海洋族群的历史，由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发掘和参证而逐渐清晰起来。

海外交通史的重点从海上交通线路的创立、发展、变迁，转向海域活动圈、华人关系网络的建构。以1990年至1991年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1998年开展国际海洋年活动、2005年纪念郑和下西洋首航600周年为契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东亚海域圈”、“中国航海文明”形成主题领域，产生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内容涵盖了古代中国与亚洲海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海洋移民史、华侨华人史从海外交通史的附庸中脱颖而出，在与中国海洋联系上突出了华人移民网络的功能和作用。

经济史的海洋研究打破海外贸易史一枝独秀的局面，海洋行业史如造船史、海运史、海港史、海洋渔业史、海盐史、海关史、海事史等，海洋区域经济史如“两湾”（北部湾、渤海湾）、“两角”（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两岛”（台湾岛、海南岛）的海洋发展史等，异军突起，百花争艳。

社会史的海洋研究从传统的倭寇研究扩大为海洋社会群体研究，从沿海地方社会研究延伸到海域社会研究，开辟了渔民社会、疍民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海岛社会、海湾社会等新领域。

边疆史的海疆研究加强了岛屿带历史的研究力度，提出构筑海上文明板块的设想。港澳台历史研究、南海诸岛史地研究、钓鱼岛历史研究，形成若干海洋史的主题领域。

军事史的海洋研究，在海防史、海军史、海战史等领域都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海洋文化史成为新的研究领域，海洋生活方式、海洋人文类型、海洋价值观念、海洋心态性格、海洋风俗习惯、海洋宗教信仰、海洋文学艺术、海上文化交流，都是研究考察的对象。海洋考古、海洋历史地理、海洋科学技术史、海洋灾害史、海洋环境史、海洋生态史研究的起步，又进一步把中国海洋史研究领域从人文海洋推进到自然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海洋,从海面推进到海底和天空。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海洋史的研究开始改变海洋仅是人类社会交往大通道的狭隘观念,把海洋视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把开发利用海洋视为一种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进程,又更进一步把人类视为海洋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来思考,从而在指导思想、研究方向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换。有学者指出:

中国研究环太平洋历史发展和海洋史的代表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教授领导的亚太区域史项目组和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领导的中国海洋史课题组。……1990年代初,杨国桢教授开始带领他的博士生探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希冀形成中国的海洋史学,相继出版了《海洋与中国》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两套系列丛书。按照杨教授的设想,第一套丛书(8本)主要探讨了中国海洋观、海港城市、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海上市场、海外移民的演变发展等。第二套丛书(12本)除了继续深化前面的研究领域之外,还相继开拓出海洋社会史、海洋灾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术史等研究领域,把中国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①

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前身是“三民主义研究所”、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从1984年起,每两年召开一次中国海洋发展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至2008年共出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10辑,在“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的框架下,从中国海洋发展的大陆沿海地区、台湾地区和海外地区,对航海交通、海洋政策、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港、海盗、海难等作专题论文探讨,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新见。

中国大陆也现出了反映海洋研究内容与进展的新平台。200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2010年起主办《海洋史研究》辑刊,内容以华南区域与南中国海海域为重心,注重海洋社会经济史、海上丝绸之路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海洋信仰、海洋考古与海洋文化遗产等重大问题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起,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国家航海》辑刊,内容涉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文化历史与政治理论、中外航海史、海上交通或贸易史、中外古船与沉船研究、水下考古、航海文物等方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些研究成果虽大多未冠以海洋文明之名,研究广度和深度也不一致,但已引起海内外史学界的注意和肯定。

然而,“这些努力远未解决海洋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也缺乏社会思想的震撼力,甚至没有改变史学工作者以陆地农业文明为中心的思维定式。从学术心态上,似乎可以这样说: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海洋迷失的误区”^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洋文化研究在中国一度形成热潮,但大多是由热点问题引发、沿海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促成的,不是学术研究深入的结果。呼吁建立“海洋文化学”学科的人,对什么是文化学并不清楚,与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建构“文化学”学科的观点和主张,在理论上和学术上没有继承、反思的关系。海洋文化理论研究的力度有限,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性质的理解分歧很大。这主要表现在学者们对海洋文明的界定存在不同的理解。

① 包茂红:《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学术研究》2008年第6期。

② 杨国桢:《海洋迷失:中国史的一个误区》,《东南学术》1999年第4期。

有人认为:“从广义上看,所谓的‘海洋文明’就是人们对围绕着海洋所进行的一系列精神、物质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成果。事实上……在工业文明形成以前的数千年间,世界各地的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都处在初级阶段,其发展也只是停留在数量而非质量的变化上。只有在工业时代到来、人类科技水平提高,其认识和利用海洋的水段达到一定水平后,海洋的深度和宽度及其巨大的能量不再成为人类活动的障碍,海洋文明才逐渐形成。”^①有人则把海洋文明往上延伸到远古时代,那时诞生了作为人类“集体记忆”的海洋文明,“在人类把目光投向大海的那一刻,人类与海洋的对话就开始了,蓝色的海洋文明在彼此注视中诞生了”^②。有人认为:“凡是一个文明体、文化区是沿海的、环海的,只要那里的社会人群懂得打鱼捞虾、煮盐晒盐、行船航运,是为‘靠海吃海’,就是有了以海洋为因子、元素的文化,就是‘海洋文化’;即使还有更小的文明体、文化区不懂得这些,不从事这些,总会接触海洋,哪怕只知道站在海边远远地一望,观一观潮,览一览浪,他们也必然会有所思所想,积淀形成并传承着对海洋的看法,也许是对海洋的‘科学’的认知,抑或是对海洋的浪漫的畅想,这同样是‘海洋文化’”,“只要海洋对这个文明体、文化区十分重要,都可以称其为由诸多‘海洋文化’现象构成的‘海洋文明’”。^③彼此尺度之严与宽相差殆十万八千里!学术界和社会上对海洋文明的理解混乱,各说各话,是长期海洋意识薄弱、海洋文明缺乏深入研究的结果。

以西方海洋文明作为衡量标准,有人认为中国有海洋文化而没有海洋文明。如说:“一种海洋文明之所以能称为海洋文明,一是它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二是这种领先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两者缺一不可。一种文明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海洋,甚至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并不一定是海洋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得益于海洋的不多,尽管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也创造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也算不上海洋文明。”^④或说:“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大陆文明为主流的文化类型,而海洋文化未经萌芽就被打入‘冷宫’,列入非主流文化之中”,“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海洋文明传统”,“而中国的古代文明形态中,海洋文明远不能占主导地位,甚至连独立于农业文明成为与之并列的一个文明形态,都十分艰难”。^⑤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中华文明的定性仍是“大陆农耕文明”。即使承认中华文明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样性、复合型文明”,也只说“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⑥,没有海洋文明的位置。这些看法,实际上只是正统主流观点的复述和微调,早就在学术界和社会中“约定俗成”、“深入人心”。问题是:一个民族国家里,只存在一种文明吗?在一个复合型文明国家里,不被历史选择为主导地位的文明就不是文明吗?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里,没有领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就

① 陈志强:《海洋文明发展的新舞台》,《文明》2010年第8期。

② 苏文菁、兰芳:《世界的海洋文明:起源、发展与融合》,中华书局,2010年,第6~7页。

③ 曲金良:《西方海洋文明千年兴衰历史考察》,《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2期。

④ 邓红风:《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见《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1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⑤ 倪建中、宋宜昌主编:《海洋中国——文化重心东移与国家空间利益》中,中国广播出版社,1997年,第560、601、695页。

⑥ 姜义华:《中华文明多样性十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2期。

不算文明吗?

有人认为:中国海洋文化是地域文化,主要指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别具特色的文化,同时也包括台、港、澳地区以及海外众多华人区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这个提法并没有错。问题是: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国的地域文化,又是海洋亚洲的地域文化,环中国海就是亚洲“地中海”,通过海洋接触、联系的,属于不同省份、不同国家的地域,互为起点和终点,互为中心和边缘,没有固定的疆界。把中国海洋文化局限于某个地区,视为地方文化的特质,或突出某个地区的领先和优秀,自称是“中国海洋文明最典型的区域”,隔断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显然是不妥的。

有人把中国海洋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进行比较,认为:“世界海洋文化并非只有西方的一个模式”,“东方也有海洋文化,也有蓝色文化”,西方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商业文化,“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本质是海洋农业文化”。^①有人把古人描述海洋生计(捕鱼、航运、经商)“以海为田”一词,望文生义地曲解为海洋农业,甚至创造出历史上并不存在的“以海为商”一词加以对照,认为中国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只不过是作为对陆地开发和利用的一种自然补充和延伸。甚至得出“海洋文明结胎、孕育于陆地文明”的推论。问题是:海洋农业文化究竟是海洋文化还是农业文化?古希腊海洋商业文化的发达建立在农牧业商品化基础上,为什么不是海洋农业文化?把中国海洋农业文化和西方的海洋商业文化视为世界海洋文化的基本模式,在理论方法上仍是西方中心主义对东西方差异概念化、程式化表述框架下的推理。这种认识更易引起海洋文明概念的混乱。

有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冲在世界最前列的,大多是用狼精神武装起来的民族”,大游牧精神“不仅包括草原游牧精神,包括海洋‘游牧’精神,而且还包括太空‘游牧’精神……而这种游牧精神是以强悍的游牧性格,特别是狼性格为基础的”^②。问题是:这位作者是站在草原遥望海洋和太空的,把人类开拓进取精神归结于游牧文明的延伸。虽然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在流动性方面有相通之处,但把海洋文明的精神说成是狼精神演变而来,这种新思维实质上也是否定中华海洋文明存在的陆地思维,不过农业文明换成游牧文明而已。

中西海洋文化比较,起点是古代中国与希腊的比较。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和克里特岛等海中岛屿,是海洋商业文明,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是黄土地农耕文明,两者起点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三千年历史走向的差异,“正是从这个节点开始,东、西方踏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③。但存在的问题是:以一个民族国家作为文明的单位,一个文明单位只有一种文明,并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实际。以中国的大陆文明而不是沿海地区的海洋文明,与希腊的海洋文明进行比较,是一种误导。中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古代文明,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型文明,由不同地区、民族的次级文化单位组成,包括了黑格尔所说的三大类型。正如美国学者彭慕兰(K. Pomeranz)所指出的:“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或者任何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

① 宋正海:《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49页。

② 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83、364、365页。

③ 《走向海洋》节目组:《走向海洋》,海洋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①

以上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陷阱”:海洋文明是西方资本主义或工业时代的产物,东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农业时代的产物,所以东方和中国没有海洋文明;西方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商业文化,中国的海洋文化是海洋农业文化,所以中国的海洋文化是陆地文化特别是农业文化的延伸。这种认识以西方海洋文明的概念为判断依据,将中国海洋文明的丰富内容排斥在外。

与此同时,也有人提出“颠覆传统”的看法。一是认为中国的文明起源和发展于海洋文明。如说:“尽管我们中华史前的历史发展链条还比较模糊,还不够具体,但大体的和合理的脉络应该是,所谓‘黄河文明’,是沿海的东夷海岱文明从黄河下游向中上游的延伸和推进;所谓‘长江文明’,是沿海的百越(粤)包括吴越文明从长江下游向中上游的延伸和推进。”^②把海洋文明置于中华农业文明的源头地位。二是认为中国是世界海洋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海洋文明傲冠全球至近代。如说:中国是15世纪前的海洋之王,从民众的海洋意识、造船技术与航海能力、文明的辐射力与持久性三个层面看,“福建是世界海洋文明发源地”^③。有人则认为发源于“中国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地区的古糯民及后来逐步分化成的糯夷、百越、百濮等民族”,提出:“中华民族在上万年前到距今6000年左右的中华炎黄时期创造了人类共同文明文化的大洲时代,那时的糯夷或沿陆路或从海路向全球开拓。因此,中华民族的海洋文明从史前的开拓到近代西方的崛起前一直引领世界,可以说,近代以前的人类海洋史,基本上说就是中华海洋史。”^④也就是用中国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

问题是:他们的书写,基本上是用自己的观点,有选择地选取前人和当代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尚无确切证据的论述,加以串联,不加证实的袭用放大,拼凑出系统和结论的,与历史本相难合符节,不能说是掌握全面史料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未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急于表达中华海洋文明是世界领跑者、优秀者的角色,其实也是焦虑不安,缺乏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总之,海洋文化的讨论与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新进展是脱节的。人们注意到这种现象:大多数学者对海洋史不太熟悉,也没有兴趣,只是运用既有的知识泛泛而谈,而研究海洋史的学者们“似乎更乐于做细微的实证研究,较少兴趣做大格局的理论探讨”^⑤。这使得中华文明史的研究主流回归到传统陆地文明的老路。

认识中华海洋文明史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现代化提出的问题的,这意味着重新审视海洋文明的概念,进行修正和重构,掌握学术话语权,是一个创新性的任务。

① [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2页。

② 曲金良:《海洋文化与社会》,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9~40页。

③ 苏文菁:《福建:海洋文明发源地》,美国强磊出版公司,2007年。

④ 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9、150页。

⑤ 李红岩:《海洋史学浅议》,见《海洋史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页。

三、海洋文明的历史学阐释

文化和文明的表现,横面是社会的变迁,纵面是历史的变迁,把文明提升到理论高度进行研究,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和演变,有多种研究视角和流派,迄今未有统一的理论架构和研究范式。最早的经典定义是:“文化和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①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所有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但这样的概括从学术研究而言是成问题的。学术史证明,简单地把文化和文明的内涵概括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失之于空泛,在学术实践上难于把握。

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都是人类对海洋的“人化”,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空间与资源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样的定义,从表象上看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实质上看,仅仅是把海洋与文化、文明的概念糅合在一起,体现不出它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特殊性,模糊了它的特质。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都是根植于海洋活动的实践,随着海洋实践活动的深入和进步不断发展,海洋与文明的结合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没有固定的、统一的模式,需要从动态的、运动变化中的历史存在,揭示它的本质。这就决定了海洋文明史的任务,不仅要关注不同时空条件下海洋文化的积极成果,反映海洋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还要关注它的消极成果,反映海洋的社会停滞与社会退步。因此,改造海洋文明的概念内涵,有助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拓展视野,有助于对海洋人文世界的深入认识,为人类文明的世界历史进程提供新的阐述。

“历史学处理的是处在时间之中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文化”^②。从历史学角度定义海洋文明,迄今还没有概括出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内涵,但这不妨碍我们根据世界与中国历史的进程,从普适性和包容性的观念出发,对海洋文明的定义提出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和支点。

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定义不同,我们承认海洋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西方工业文明等同的文明形态,是全球海洋时代产生的一种形态,但不是海洋文明形态的全部。海洋文明作为按经济生活方式划分的文明类型,是一种文化的进程,其内涵包括从低到高、从初始文明到现代文明的不同形态,和跨越从区域海洋到全球海洋、立体海洋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为国家或区域的海洋文明,各有不同的特性,在不同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既有崛起后衰落,又有衰落后复兴或再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海洋文明存在于“海—陆”一体的结构中,与陆地文明并非高低优劣的二元对立,两者的互动,就是人类参与世界发展的进程。因此,十分有必要打破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孤立、隔绝阐述的局限性,从人类文明的全局来重新认识。

(一)海洋文明是源于海洋活动生成的文明类型

人类生活空间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同,决定了文明的第一属性。海洋文明起源于大陆边缘地带周边

① [英]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② [美]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页。

被陆地拥抱、半封闭式的海洋地理区域,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发生的地理基础不同,生存的机遇和挑战在于海洋,文明的出发点和发展的舞台在于海洋。最初的海洋活动受制于港湾的环境,季风、洋流等自然规律,人类与之发生关系,都是从局部海域出发,逐渐探索出和形成了相对固定、约定俗成的出海时间、航行方向、交往对象和海域范围,海洋文明的诞生都在特定的海域。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之间的地中海具备这样的天然条件,大西洋两岸的北海、波罗的海与巴利比海,印度洋沿岸的红海、波斯湾等,西太平洋沿岸的渤海湾、北部湾、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等,也是“地中海”,也有相似、相近的地理条件,都有开发利用海洋、产生海洋文明的可能。

海洋作为一个自然体,对濒海的各民族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开放或封闭的区别。但地理不是文明发展的决定因素,并非所有族群的海洋文化都能自然地生成海洋文明。只有海洋族群取得开化和进步,有突破大海隔离和束缚的造船和航海能力,有走向海洋的进取意识,同时获得与外部族群接触联系和文化交流的机遇,才能成为“海生的女儿”。与外界隔绝的海上活动和孤岛生活,缺少对外交流的活力,是“封闭型”的海洋文化,没有海洋文明的生成与传播。

中华民族的先民生活在东亚大陆和海域,依据不同的地理条件,选择不同的生存方式。海洋文明起源于滨海与岛屿先民的渔捞生活,定居的聚落是由于有丰富、稳定的鱼贝食物来源所形成的,并非农业文明的产物。濒海聚落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往往发展为港口,甚至是海洋族群建立的早期国家的国都。他们通过大海沟通环中国海不同区域的联系,并将文明传播到西、南太平洋的岛屿上。在中华海洋文明生成后的历史发展中,海洋族群发生由东夷、百越向汉人的转换,作为海洋活动主体的国家、地方和民间的关系发生激烈的变动,但始终没有消灭海洋文明类型的存在。研究海洋文明类型内部结构的历史变迁,是构成中华文明史多样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正确处理海洋文明类型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的关系,是彰显中华海洋文明独特性和“个性化”本质的重要前提,也是探寻中华海洋文明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二)海洋文明是海洋文化有机综合的文化共同体

海洋文明是以自然海洋为活动基点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及交往方式、精神生活方式有机综合的文化共同体。海洋文化是海洋文明的内涵,海洋文明是海洋文化的载体,广义的海洋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以流动为基本特征:流动的家(舟船)、流动的生计(捕鱼、贸易、劫掠)、流动的文化(海洋渔业文化、海洋商业文化、海洋移民文化、海盗文化),流动的疆界(超越地理、国家和地方政区的边界),在流动中与不同海上文明和陆地文明接触、冲突、融合,形成不同海域、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海洋文明。在海洋文明史上,不同的海上群体和陆上涉海群体塑造了不同的海洋社会模式,如海洋渔民社会、船员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舟师社会,海岸带港口社会、渔村社会、盐民社会、贸易口岸社会等等。各种群体成员具有共同的生计、身份、生活目标和利益,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互动结合在一起,形成各具特色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规范。

环中国海周边海洋文化共同体的活动,此起彼伏,生生不息,为当代的研究所肯定。就中华民族的海洋发展而言,海洋文化共同体的表现丰富多彩,在开发利用海域、岛屿,发展中华民族的海洋权利,做

出了重大贡献。只是由于历代王朝统治者认为海洋并不重要,而被忽视和屏蔽了。甚至视流动为洪水猛兽,把海民看成社会上最不可靠的一群,诋毁海洋文化共同体的形象,通过强势的话语权,植入民族的社会心理,造成负面的影响。以海洋为本位,从底层结构入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恢复海洋文化共同体的本来面目,确立海洋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的一元,改变忽视海洋的传统观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对树立中国海洋国家的正面形象,开展海洋文化建设,培育海洋国土意识、海洋可持续发展意识、海洋权益意识和海洋安全意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系统

海洋群体对海洋自然的“人化”,人与人在海洋中结成的关系,有自身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不是人地关系、陆地社会关系的自然延伸。从陆地走向海洋,与从海洋走向陆地,是两种不同的海洋文明发展路径。海洋文明有自身进化的过程,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小系统。文明系统包括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①存在渐变、突变、重组的不同进化形式。在不同的海洋地理区域,海洋文明的发生发展有先有后,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有不同的目标和追求,有不同的阶段性文明成果,有不同的文明样式、特定的结构和文明的象征,构成多彩的海洋人文世界。

中华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系统的组成部分。中原农业文明处于核心和强势的地位,主导并决定“多元一体”的走向,沿海海洋文明处于地域社会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层次,没有上升为中华文明的主流。但单凭这一点,还不能得出“海洋文化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的结论。从海洋文明的主体看,早期是东夷、百越的文化系统,秦汉是华夏与东夷、汉与百越互动中共生的文化系统,汉唐以后是汉族移民与夷、越后裔融合的文化系统。中华文明中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关系,是大系统与小系统的关系,必须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海洋文明的演进进行全面考察。中华海洋文明又是东亚海洋文明系统中的中心系统。东亚海洋文明系统即“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圈”,从远古到秦汉,是沿海土著的中华先民与周边岛屿土著之间接触交流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汉唐以后与周边、西亚的海洋互动,被称之中国主导的“东亚海域经济文化圈”,与现代的“世界华人经济文化网络”一脉相承,包涵了中华海洋文明与外来海洋文明的亲近、融合与竞逐、分离,超越了中国历史的范围,如果不是以王朝统治者的心态看待海洋,用王朝经略海疆取代中华民族的海洋发展的话,应当承认,中华海洋文明系统的向外用力大于向内用力,影响着东亚海洋文明的走向。中国在与西方海洋势力竞逐中的顿挫和衰落,也有中华海洋文明系统的自身的原因。

站在世界海洋文明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中华海洋文明的历史嬗变,是海洋文明史研究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同时有助于凸显中华海洋文明史与世界海洋文明史的交互与碰撞、关联度和依从关系、普遍性和差异性等等。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进一步阐明中华海洋文明的博大精深,才能透过世界正视中华海洋文明历史发展中的精华与糟粕。

(四)海洋文明是一种文化发展的过程

“文明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状态模式,是航行而不是停泊”^②。海洋文明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人类

① [美]L.A.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沈原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1页。

② [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沈辉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7页。

文明的先进形态,而是一种文化发展的过程。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根植于海洋活动的实践,随着海洋实践活动的深入和进步不断发展,总体的历史趋势是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演进,从区域海洋向全球海洋、立体海洋拓展,从群体文明到区域社会文明、国家文明、世界文明提升。以西方海洋世界为本位,海洋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再到太平洋的转移,代表了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历程。但世界海洋文明史不是以西方海洋文明为唯一模式和标准,朝着同一方向进行,非西方有多元的海洋文明的“中心”和“边缘”,以渐变的形式进化,海洋文明各具特色,对世界海洋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未来海洋文明的走向,取决于立体海洋开发的文明进步、合作共赢的世界新型海洋秩序的建立。

中华海洋文明的文化发展过程与西方海洋文明的文化发展过程,既有相向而行,又有反向而行;既有隔绝,又有交汇。中华海洋文明内部,不同海域、不同族群、不同地方政权,海洋文明的发生发展有先有后,有兴起也有衰落,有继承也有断裂,有进步也有倒退,展现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海洋与文明的结合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特征,没有固定的、统一的模式,但总体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中华海洋文明的复兴,是历史的继承发展,朝着立体海洋时代的需要不断地调整和跨越,能够为世界海洋文明的转型提供正能量。

(五)海洋文明是一种长期的、综合的文化累积

海洋文明的流动性、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的特质,是吸收陆地文明、外来文明,经过长期的、综合的文化累积形成的,在与陆地文明的互动中从区域走向全球,扩张其影响力,使人类社会逐渐地连成一体,形成海陆互动的世界历史大格局。海洋文明离不开陆地文明的哺育,陆地文明也得到海洋文明的反哺。海洋与陆地对立的观念,不能真实地反映海洋文明在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的作用。认为世界古文明都是陆地文明,唯独古希腊文明发源于海洋是个例外,这种说法带有片面性,已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以克里特——迈锡尼为中心的爱琴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受到古埃及和两河文明的积极影响。……这两个近东的古老文明比克里特文明早600~700年。而且克里特人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联系相当密切。可以说,以克里特——迈锡尼为中心的爱琴文明是在近东两大先进文明的辐射下产生和发展的,因而起点较高,以致克里特人能较早创造出像米诺斯王宫那样令世人惊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古希腊文明既继承和发展了爱琴文明,又受惠于近东各种文明的传播和影响。”^①“地中海历史的规律是:海上生活向着远离海岸的地方扩展影响,作为回报,又不断受内陆的影响”,反之,“如果说埃及是尼罗河的产物,它也同样也是地中海的产物”。^②

四、余论

海洋文明进入中国历史的进程,是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相激荡的过程,也就是陆海文明兼容、互动的过程。海洋活动的主体,血缘上经历夷夏、汉越的融合进入华夏——汉族的边缘,到今天对中华民族

① 朱寰主编:《欧罗巴文明》,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序言。

②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的认同;领域空间上,东部沿海地区和管辖海域,从古代的边缘地带向近现代的中心地带转移,上升到当今的国家利益的核心地带,都是长时段的历史建构过程。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基地的农业文明群体,最早在中华文明中确立了强势的地位,建立王朝体制,主导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发展进程,陆地因素在中华海洋文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显示了与其他国家海洋文明不同的特性。早期大陆对海产品的强烈需求,吸引了一部分海洋群体的内向发展,接受农业文明的辐射,东夷百越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后,海洋活动群体被移入沿海的汉人所取代,具有海洋与陆地两重性格。中华文明是黄河、长江的产物,也是环中国海的产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海洋文明被占主流地位的中华农业文明所深深浸染,王朝“经略海洋”有不同的表现,体现中华文明中的陆海关系也是不同的。简单地一刀切,认为都是开疆拓土向岛屿带的延伸,是宗藩关系在海外国家的推广,忽视了特定时期王朝作为“国家海洋行为主体”的意义和功能,势必影响到中华文明中陆海关系的正确揭示。

著名史家王赓武先生指出:“全球化是海洋实力取代陆地实力的象征性标志”^①。当代中国为融入全球化而努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②继承弘扬中华海洋文明,实现现代化转型,是海洋强国必走的一条路。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方向和需求,深深扎根在悠久的海洋文化优秀传统之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借鉴国外研究海洋文明史的优秀成果和经验,建构适应现代需要,反映中国特色的中华海洋文明史,努力开展创新性研究,把沉淀于沿海地方和民间层次的海洋历史资源加以提炼,成为系统化的知识。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增强理论体系的建构,思考继承弘扬中华海洋文化优良传统,提升国家海洋软实力的方向与方法,为建设现代海洋文明服务,具有全新的意义。

责任编辑:李光伟

① 《王赓武谈全球化海洋文化:中国须加强海洋外交》,2013年3月22日, http://www.haijiangzx.com/2013/worlddds_0322/76837.html。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页。

lence. Therefore, Foucault thinks that the Panopticon model is destined to penetrate into every corner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impel it to produce some kind of Panopticism, which will become the essence of the political operations of the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The Analytic Philosophy as a History

Jiang Yi

In the 21st 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e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own history. In their view, as the reason, only exploring the occurring and developing history can help people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meaning of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the value of questions it focused on. And, analytic philosophers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Trying to reveal the mental kinship above, analytic philosophers want to show that analytic philosophy inherits the wester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an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s a successive history. The strong preoccupation with history not only reflects the maturity of analytic philosophy but also means that the analytic philosophy has been back to the tradi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On Chinese Ocean Civilization

Yang Guozhen

Ocean civilization is the type of civilization generated by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marine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Is ocean civilization one o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n organic part, or just new exogenous factors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at is the question asked by Chinese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examin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ocean civilization, mod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o master the academic discourse, is an innovative and significant task.

Ocean Exploration and Marine Development of Emperor Wu of Han

Wang Zijin

During 54 years of ruling, Han Wu had gone for near sea patrol for 10 times at least. The motive behind Emperor Wu's near sea patrolling includes ocean exploration as well as pursuit of immortality. The alchemy culture facilitated the expansion of the belief of the immortal world in the sea. The activities of alchemists obtained supports from administrative power represented by Emperor Wu, which in turn promoted the exploration of unknown ocean world. The model of ocean created in palace embodies the pursuit of "Penglai" as well as intimacy of Emperor Wu's mind toward ocean. Resort to house boat army during the Han Empire's conquering of the Nanyue and the Korea proved to be a great innovation in maritime strategy. Emperor Wu of Han era also witnessed the outstanding development of Oriental and Nanyang shipping industry. Marine productions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ocial economic life in Han Dynasty. Any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history of Chinese marin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should not ignore the relevant achievements of Emperor Wu of Han era.